

# 文体正变与辨体破体： 元好问的文体观念论析

任竞泽

**【摘要】**以《论诗三十首》为总纲，元好问的文体观念丰富而自成体系，包括不以绳墨自拘的文体正变观、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论及其以词为诗与以文为诗的破体论等。元好问的文体观念受到宋代苏轼、黄庭坚、朱熹等人的影响，并与金代王若虚、刘祁及元代郝经、潘昂霄等人的文体观念有相通之处。这反映出宋金元文体观念的互相渗透，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影响。

**【关键词】**元好问；正体变体；以词为诗；以文为诗；遗山体

**【作者简介】**任竞泽，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民族文学研究》（京），2023.5.116～13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中日韩诗话的文体史料与文体观念”（项目编号：19FZW042）阶段性成果。

作为金代文学之巨擘，元好问向来是宋金元文学比较研究的焦点，相关专著及论文成果极为丰硕，涉及史学、哲学、儒学、道教、佛教、书学、医学、民族、美学、民俗、教育、画论、乐论、文学、文论及其文体等方面。其中文体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多种文体形态和文体题材的研究上，前者如散曲、辞赋、小说、碑传文、碑志文、碑铭文、杂记文、序跋文、记体文、词序、词题、七言律诗、七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绝句、乐府诗、论诗诗等，后者如边塞诗、丧乱诗、儿童诗、隐逸诗、杏花诗、咏史诗、涉梦诗、咏花诗、山水诗、赠答诗、绝笔诗、理趣诗、宛西诗、忻州诗、东平诗、唱和词、山水词、咏物词、杏花词、纪梦词等，大体是着眼于文体的文学研究。而相关的文体观念和文体理论研究，则多为词体及分类方面的个案研究<sup>①</sup>，还缺乏对元好问总体的文体观念进行的观照。我们遍检元好问文学作品及历代评论史料中的文体言论，以《论诗三十首》为总纲，全面分析和系统构建其文体思想体系，并与金代王若虚及宋元文体观念进行比较，以见其在宋金元文体批评史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

地位和影响。

## 一、论正体与无定体：不以绳墨自拘的文体正变观

《论诗三十首》集中反映了元好问的文学思想，亦包含着丰富的文体思想。其中第一首又是组诗的理论总纲，而这个总纲则体现了其有关正体与伪体、正体与变体及雅体与俗体之间辩证关系的文体通变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文学思想是以文体思想贯穿始终并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如《论诗三十首》：“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sup>②</sup>也就是说，有感于古代诗学史发展过程中正体与伪体的混乱不一，他通过辨析诗史演变的正伪清浊，从而厘清并使得诗体承传脉络变得泾渭分明。

《论诗三十首》不仅在文体形式上沿袭了杜甫《戏为六绝句》，而且这一文体理论总纲也继承了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之辨析正体与伪体的辨体观念，且这个“正体”就是《诗经》“风雅”及“汉谣魏什”的雅正之体，与“俗体”亦为对立范畴。此外，文体的“奇正”观念也是这一文体观念的体现，如“奇外无奇

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sup>③</sup>血籍中其此类相关言论的文献颇多,都是这种文体观念的体现。

其一,关于正体,元好问往往称“岂文之正哉”“学术醇正,文笔高雅”“唐宋文派乃得正传”“不足以知诗文正脉”“文章圣心之正传”等,如《中州集》卷四周昂小传:“德卿传其甥王从之文法云:……文章以意为主,以字语为役……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学术醇正,文笔高雅,以杜子美、韩退之为法,诸儒皆师尊之。”<sup>④</sup>《闲闲公墓铭》:“及翰林蔡公正甫……唐宋文派,乃得正传。然后诸儒得而和之。”<sup>⑤</sup>《鸿水集引》:“宋君以文章名海内久矣……某不敏,不足以知诗文正脉……呜呼!文章,圣心之正传。达则为经纶之业,穷则为载道之器”<sup>⑥</sup>。以上所论虽更多着眼于与诗文内容形式、文道关系、儒家思想、文章不朽等有关的文学创作、文学功能的师法传承等,但这些关乎“雅正”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流派的复杂问题,若以“正体无人”与“细论”这一文体论总纲来看,就可以简明地从“正体”这一文体学视域被观照,其具备提纲挈领的意义。

对于元好问这种以传承风雅传统之正体和疏凿清浊泾渭之辨体为己任,从而使得金朝百年以来能够形成“得文派之正”的文学思潮功绩,元朝以来历代文论家在评价元好问诗文创作及文论价值时多有论述,并多从文体体派的文体学视角进行总结。

如论古文文体派,元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曰:“成一代之典,使斯文正派,如洪河大江……窃尝评金百年以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北渡则遗山先生一人而已。”<sup>⑦</sup>清李祖陶《元遗山文选》评《答聪上人书》:“一代之文,必有一人为之宗主……量体裁而权利病,使文体悉轨于正……先生所以为一代宗主。”<sup>⑧</sup>以上论述皆注意到元好问通过“量体裁”的考量来辨识文体利病正伪的辨体理论识见,以及纠正文坛弊端并“使文体悉轨于正”的文体创作实践。

论诗体,元郝经《遗山先生墓铭》曰:“诗自《三百篇》以来,极于李、杜,其后纤靡浮艳,怪诞癖涩,寔以

弛弱,遂失其正。二百余年而至苏、黄,振起衰暗,益为瑰奇,复于李、杜氏,金源有国……委坠废绝,百有余年,而先生出焉。当德陵之末,独以诗鸣,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沈郁太和,力出意外。巧缛而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sup>⑨</sup>。结合历代诗体的语体风格的盛衰变迁,指出金人文学风气之所以能够“粹然一出于正”,正是元好问以“上薄风雅,中规李、杜”之正体纠正当时沿袭六朝以来“纤靡浮艳,怪诞癖涩”之“伪体”“失其正”的正本清源的文体革新功绩。又如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予尝仿遗山《论诗绝句》,论遗山诗云:‘评论正体齐梁上,慷慨歌谣字字遒。’”清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别李周卿三首》其二:寻源溯流,确是正派。”<sup>⑩</sup>这些论述亦以元好问“正体”“正派”的体派术语和文体概念来仿作诗体和展开文体批评,也反映出元好问文体观念的深远影响。

诗体、文体并谈者,如元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元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先生独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学者归仰,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系而不绝,其有功于世又大也。”<sup>⑪</sup>其都看到了元好问文学创作成就和文学革新功绩归根结底在于其文体观念。

其二,关于变体,元好问着眼于唐五代宋辽金的“文体古今之变”,针对“巧伪失天真”之“伪体”盛行而致诗道崩坏的文坛弊端,提倡“正体”和“新体”。如《中州集》:“衰俗波荡中,挺挺有烈丈夫风气……不应以文体古今之变,而疑仙语也。”<sup>⑫</sup>“观察显卿云:‘文章变古名新体……’”<sup>⑬</sup>《闲闲公墓铭》:“唐文三变,至五季,衰陋极矣。由五季而为辽、宋,由辽、宋而为国朝,文之废兴可考也。”<sup>⑭</sup>《赠祖唐臣》:“诗道坏复坏,知言能几人。陵夷随世变,巧伪失天真……珉玉何曾辨,风花祇自新。”<sup>⑮</sup>以“珉玉何曾辨”喻正伪辨体,以“风花祇自新”倡变体革新。

后人针对其对“伪体”的纠偏和“自成一体”之诗格丕变、创新也有总结阐述,如冯舒、冯班评《自题中州集后》第三首:“此篇言不可为伪体所乱,当时但有

大观大清楼帖耳。”李慈铭评《遗山先生诗集》：“杜、韩以后，推遗山为大宗，其诗各体皆老成……始读而喜之，稍仿其体，诗格遂丕变。”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元遗山自创一种拗体七律……此体亦不始于遗山……然遗山七律，亦有自成一体”。<sup>⑩</sup>元郝经则对于元好问今题乐府的文体创新极力赞赏，如《遗山先生墓铭》：“为古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以写怨思者……用今题为乐府，揄扬新声者……皆近古所未有也……先生遂为一代宗臣，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sup>⑪</sup>以上文章皆从文体创新也即变体、破体的视域观照元好问的诗体嬗革特征。

其三，关于文体的正变观，元好问提出有常有变、奇正相生、岂有定体、不拘一律、不以绳墨自拘、变而不移、正而不随的变而不失其正的文体辩证观，而“以体制论正变成为传统文体批评的重要方法原则”<sup>⑫</sup>。对于相关文体观念我们以元好问的言论为基础，结合王若虚、郝经等人的文体理论进行分析及论述，以见其间的影响关系。

一是文体的常变、正奇。对此，元好问《诗文自警》曰：“文章有常有变，如兵家有正有奇。”<sup>⑬</sup>所谓“自警”，说明其对“文章”及其“文体”之“有常有变”“有正有奇”的文体变迁规律特别重视。这一点可以说元好问与王若虚不谋而合并互相影响。如论常变，王若虚提倡为文“不主故常，不专蹈袭”<sup>⑭</sup>，“凡人文体，固不必拘”<sup>⑮</sup>，更为明确地从“文体”视域来看待常变问题。论正奇，如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六：“党世杰尝言：‘文当以欧阳子为正，东坡虽出奇，非文之正。’定是谬语。欧文信妙，诎可及坡？坡冠绝古今，吾未见其过正也。”<sup>⑯</sup>与元好问一样，王若虚最推崇苏轼，辩驳并认为苏轼之文虽奇但“未见其过正也”，也即变而不失其正。考虑到元好问与王若虚的密切关系，相关文体观念无疑能够互相生发。

二是元好问提出的“岂有定体”这一诗体与文体的交融通变观。如《中州集》卷二刘汲小传：“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谓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故《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

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sup>⑰</sup>从“诗言志”和“心声心画”之诗论总纲和文体风格的宏阔视野，来辨析诗体与文体的“变体”与“定体”的辩证关系，堪称古代文论史上将“辨体”与“破体”这一文体理论核心问题结合起来看待的典范。

与之相似，王若虚也提出“定体则无，大体须有”这一辨体辩证观，并屡屡为当代文体学者所引用，即《滹南遗老集》卷三七：“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sup>⑱</sup>针对此则文献，吴承学认为，文体虽没有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体制，但必须有相对的总体体制。“如果没有‘大体’，也就取消了各种文体的个性；文体之间没有区别，也就无文体可言。”“这是一种辩证的观点，‘大体须有’，故应辨体；‘定体则无’，故可破体。”<sup>⑲</sup>

三是与王若虚所谓“凡人文体，固不必拘”的文体观念相似，元好问也反复提出诸如不以绳墨自拘、不拘一律、“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等文体通变观念。如《中州集》卷三赵秉文小传：“大概公之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sup>⑳</sup>这也是对赵秉文主张“不执一体”文体观念的强调。赵秉文这一观点在刘祁《归潜志》中有记载：“赵闲闲教后进为诗文则曰：‘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sup>㉑</sup>这与王若虚所言之“然世间万变，皆与古不同，何独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sup>㉒</sup>，也不无相通之处。当时关系密切的几位金源大家元好问、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刘祁等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这一文体通变观，足见当时已经形成一股强劲的文体思潮，这在中国古代文体思想史上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此外，元好问引述并认可的唐末陆龟蒙所云“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的观点，更为鲜明地道出了元好问这一文体观念。如《校笠泽丛书后记》：“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信亦无愧云。”<sup>㉓</sup>关于这一引言，元好问在《双溪集序》中又称：“前世诗人凡有所作，遇事



辄变化,例不一其体裁,乃欲与造物者争柄”<sup>③</sup>,则无疑可以看出该引述已经内化为元好问自己的文体观念。

其四,关于雅体、正体及俗体、杂体的雅俗辨体。该类对立的文体范畴往往从语体的角度,将古雅、典雅与俚俗、鄙俚对举提出,从雅体、俗体的文体视域来烛照传统的雅俗之辨。如《中州集》卷二刘汲小传:“屏山(李纯甫)为作序云:……齐梁以降,病以声律,类俳优然。沈宋而下,裁其句读,又俚俗之甚者……李义山喜用僻事……殊无典雅浑厚之气……黄鲁直天资峭拔,摆出翰墨畦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sup>④</sup>。《中州乐府》:吴激《人月圆》,“时宇文叔通亦赋《念奴娇》先成,而颇近鄙俚”<sup>⑤</sup>。《东坡诗雅引》:“五言以来,六朝之谢、陶,唐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为近风雅,自余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久矣。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其理然也。”<sup>⑥</sup>《送诗人秦略简夫归苏坟别业》:“论文一樽酒,雅道谁当陈。”<sup>⑦</sup>《别李周卿三首》其二:“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死……衣冠语俳优,正可作婢使。”<sup>⑧</sup>这种雅体与俗体之文体范畴对举观点的提出,较早出于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序》:“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安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sup>⑨</sup>所谓“审鉴诸体”即为“辨体”,与元好问的雅体、俗体之辨体相似,可见其渊源有自。

针对元好问既崇雅鄙俗又以俗为雅的雅俗辩证文体观,元人多有总结和褒扬,如刘秉忠《再读遗山诗》:“蜀锦丝头从此细,巴歌韵脚自来宽。未言雪曲无人和,传者几希作者难。”《细读遗山诗》:“未得深源传正派,漫将鄙语入冥搜。”郝经《祭遗山先生文》:“先生雅言之高古,杂言之豪宕,足以继坡、谷”。吴澄《张仲美乐府序》:“风者,民俗之谣。雅者,士大夫之作。故风葩而雅正。后世诗人之诗,往往雅体在而风体亡……国初太原元裕之,以此擅名……其辞丽以则,而岂丽以淫者之所可同也哉。”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极其变而归之雅……北渡则遗山先生一人而已……乐府则清雄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sup>⑩</sup>凡此均可与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组诗中所谓“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

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sup>⑪</sup>等相印证。

## 二、量体裁与遗山体: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论

与正体相似,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论是宋元以来文体批评的核心论题,宋代欧阳修、黄庭坚、陈师道、严羽、朱熹、真德秀、王应麟以及金代王若虚和元代郝经等都有所论及。相对而言,元好问在此方面有所欠缺,没有明确的“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表述,但是通过诸如有体裁、量体裁、有规矩、有律度、有绳尺、遵法度等相近表述,我们也能看出他的这一文体观念。下文结合宋代黄庭坚、陈师道及金元王若虚、刘祁、郝经等文体理论大家的相关论述来说明元好问的这类辨体观念。

其一是量体裁与有规矩,得其体与遗山体。关于量体裁、有体裁的辨体论,如元好问《答聪上人书》:“至于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证真贋,考古今诗人之变,有戛直而无姑息,虽古人复生,未敢多让。”<sup>⑫</sup>《王黄华墓碑》:“为文能道所欲言……辞理兼备,居然有台阁体裁。”<sup>⑬</sup>王若虚亦提倡“有体致”,如“若王则贵议论文字有体致,不喜出奇”<sup>⑭</sup>。

关于有规矩、有律度、得其体、失其体的辨体论,如《中州集》卷五赵元小传:“作诗有规矩。泰和以后,有诗名河东。”<sup>⑮</sup>《中州集》卷九张樾小传:“为人有蕴藉,善谈论。文赋诗笔,截然有律度,时人甚爱重之。”<sup>⑯</sup>王若虚亦云:“文章必有规矩准绳,虽六经不能废。”<sup>⑰</sup>《中州集》卷九李著小传:“诗文得前人体。工于字画。”<sup>⑱</sup>《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辞气容貌不失其为大臣之体……谨奉行而重改作,得守文之体”<sup>⑲</sup>。“得体”与“失体”是中国古代文体理论中的一组重要对立范畴,大体上分别对应于“辨体”和“破体”或“有体”与“无体”,是宋以来“文章有体”之辨体观的一种别称。

这种“文章有体”的辨体观,自黄庭坚大力倡导而为宋元以来的历代文论家所瞩目和认可。黄庭坚往往称“文章自有体”“论文自有体”<sup>⑳</sup>等,陈师道的“诗文各有体”<sup>㉑</sup>与此相似。影响所及,如宋陈造《张使君诗词集序》曰:“文章自有体,豫章翁语,学者法

也……要自有体之言……文章有体,造豫章之奥者欤!”<sup>④</sup>罗大经云:“杨东山尝谓余曰: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sup>⑤</sup>

与元好问关系密切的金人刘祁、王若虚对此多有继承并反复论述,可与元好问之论相印证。如刘祁《归潜志》卷一二:“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sup>⑥</sup>其中“文章各有体”的“辨体”内蕴,正是吴承学对“辨体”进行界定的要义:“坚持文各有体的传统,主张辨明和严守各种文体体制,反对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创作手法”<sup>⑦</sup>。

元代以来的评论家也看到并赞赏元好问诗文作品的文各有体、有体要、量体裁、有规矩、有准绳、有法度、不失轨范的正体、得体、辨体特征,尤以元人和清人为最。元代学者所论,如郝经《祭遗山先生文》:“先生雅言之高古,杂言之豪宕,足以继坡、谷,古文之有体,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党”。王恽《遗山先生口海》:“先生……而于体要工拙,音韵乖叶,尤切致恳。”脱脱《金史·元好问传》:“为文有绳尺”。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sup>⑧</sup>其中,郝经所评“古文之有体”可补元好问欠缺明确的“文各有体”“文章有体”表述之不足。

清代学者所论,如《四库全书提要》之《遗山集四十卷附录一卷》提要:“至古文绳尺严密……而碑版志铭之作,尤为具有法度。”元魏初撰《青崖集五卷》提要:“其学本出元好问……不失先民轨范。”冯舒、冯班评其《先大夫小传》:“家传只如此,便得体。”李祖陶《元遗山文选》评《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起首一段,妙在说得有体……真卓然成体之文。”<sup>⑨</sup>诸家所评其古文“说得有体”“家传得体”“不失轨范”云云,正是其“文章有体”之辨体观念的体现。也正因此,其诗文成为时人和后人所学习及效仿的文体典范,即元房祺所谓“为文楷式”,郝经所云“文模道程”等。<sup>⑩</sup>

在文体理论和创作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元好问

形成了自成一体的“遗山体”,在清代为众多学者所效仿。“遗山体”主要在清初和晚清同光年间为人所瞩目,明确提出“遗山体”的是明末清初的费经虞,其《雅伦》云:“元遗山体:金末元好问之诗。本传云:遗山诗奇崛而绝雕剜,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sup>⑪</sup>其用本传来说明“元遗山体”,可见是说“遗山体”指各类诗体及词体,且主要特征为具有奇崛慷慨的建安风骨和沉郁顿挫的杜甫风格。其后,清初张潜删节费经虞《雅伦》而成《诗法醒言》,其“元遗山体”亦承之,只指出为“元好问之诗”,而对杨维桢“铁崖体”却有明确解释<sup>⑫</sup>,这也说明此时“遗山体”的内蕴还是模糊不清的。清初田雯拓展了“遗山体”的文体内蕴,将之定型为特指《论诗三十首》这一“论诗诗”文体形式并加以效体的仿作。如《读元人诗各赋绝句》:“千年风雅遗山体,半格堂堂妙入神。商略论诗三十首,如何直作济南人。”<sup>⑬</sup>其中,田雯所谓“遗山体”的文体特征一方面指元好问尊崇《诗经》风雅以来的雅正之“正体”;另一方面,关于诗题为“商略论诗三十首”,亦可见“遗山体”专指《论诗三十首》这一体裁。其影响所及,晚清同光年间对此言及并效体的逐渐多起来,有叶廷琯、唐仁寿、谢章铤、祁寓藻、徐世昌、尹元炜等,所云诸如“客窗偶仿遗山体,论字先成杂帖诗”<sup>⑭</sup>，“唐仁寿《论六朝诗绝句仿元遗山体》”<sup>⑮</sup>，“暇日偶仿遗山体,杂缀以绝句”<sup>⑯</sup>，“渔洋亦学遗山体,只为论诗到古人”<sup>⑰</sup>，“集中《论诗绝句三十首》，仿遗山体”<sup>⑱</sup>，“仿元遗山体论国朝诗人诗”<sup>⑲</sup>等，都毫无例外地将“遗山体”指向《论诗三十首》。这也是清代效仿“遗山体”而使“论诗诗”这一诗论及文体形式走向繁荣的折射。

其二是崔立碑与铁券文。元好问“以体制为先”的辨体、尊体观念,最能从其知制诰撰写“王言”体中体现出来,分别是崔立之变事件中撰功德碑和铁券文体考辨两例,且都与金元易代之际政治及历史事件密切相关。

关于“崔立变”及王若虚、刘祁、元好问为其共撰

功德碑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金史·王若虚传》曰:“王若虚……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论之。’……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其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sup>⑥</sup>文中所谓“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以“王言之体”的文体规范为由拒绝。元好问认为刘祁之“草定”不符合王言文体体制,不得体即“意未惬”,故而“乃自为之”,最后三大家“乃共删定数字”,也只是实录直叙,并未歌功颂德,体现出元好问文体观念的权变。这正如余敏所言:“碑志文最难做到适当得体,元好问碑志行文以事实为依据,采用不同的叙事策略,在颂美与史实之间取得平衡。”<sup>⑦</sup>

王若虚屡屡称“制诰王言,决不可失体”,可进一步说明崔立碑事件中元好问的尊体、辨体观念。如《淳南遗老集》卷三七:“凡人作文字,其它皆得自由,惟史书实录、制诰王言,决不可失体。”“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来,制诰、表章率皆用之,君臣上下之相告语,欲其诚意交孚,而骈俪浮辞,不啻如俳优之鄙,无乃失体耶?”<sup>⑧</sup>他通过要求处于文体价值序列顶端的“制诰、表章”和“制诰王言”必须严格遵守体制规范,不可破体变体,来说明、提醒和警示“失体”之弊,这与崔立碑事件中诸家的文体观念殊无二致。

元好问还对“铁券”这一王言文体的文体特征、文体源流和文体规范进行了详尽考辨。如其在《章宗皇帝铁券行引》一文中,首先考证唐史所载铁券之说的两种文体功用,即“臣尝考唐史所载铁券之说有二:其一则将相有社稷之功者赐之,其一则许藩镇以自新者也”,接下来指明“铁券”的文体内涵:“辨理曲直,洗涤怨恶,质之于天地而示必信,申之以丹铁而图不朽……故所谓丹书之信,特迫于不得已焉而与之耳。”<sup>⑨</sup>他以亲见的金章宗完颜璟对铁券文体质疑

的《铁券行》为证,即“道陵朝,有以田氏所藏唐赐藩镇铁券来上者,上为制七言长诗,以破其说,名曰铁券行,臣幸获睹焉”,进而指出铁券源于誓诰的文体源流,即“自圣人以书契代结绳之政,大朴虽散,天理之真淳者,犹在人也。治稍下衰,而誓、诰兴。信不足,有不信。夏后作誓而民始叛,殷人作诰而下益惑。盖自结绳而为书契,自书契而为誓、诰”,最后得出结论:“况又自誓、诰而为铁券,其欲使人不叛且惑亦难矣。故施之藩镇,不可也。黄河、泰山之盟,不能救韩、彭于旋踵之顷,‘赤心’‘白日’之语,又安可保唐室于威令复振之后乎?施于功臣,亦不可也。君不得于其臣而与之不为不直,臣不得于其君而受之为不义。不直,不义,几何其不以功臣为藩镇也……其视前世誓、诰之繁,固已贯三光而洞九泉矣,况于恃片铁以为固者乎?”<sup>⑩</sup>认为“施之藩镇,不可也”和“施于功臣,亦不可也”,对唐史所载铁券的两种文体功用加以辨伪和否定,表现出元好问强烈的辨体意识。

颇有意味的是,元好问铁券辨体亦与崔立之变事件中时任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国用安一同叛变有关。现存金代唯一的铁券文为李介然《赐国用安铁券文》<sup>⑪</sup>,而国用安1228年降元,1232年降金,《赐国用安铁券文》所录即为此事。此时元好问刚从南阳县令调往汴京任知制诰,1233年汴京失守,崔立向蒙古请降献城并命撰功德碑,国用安随同崔立降元,随后又降宋,并于1234年为元兵剿杀。所以,元好问《章宗皇帝铁券行引》当为《赐国用安铁券文》和国用安反复降于宋金元之间的这一铁券文体笑话有感而发。这与其洞察唐代滥赐铁券于藩镇致藩镇之叛乱频发,进而指出铁券“施之藩镇,不可也”的文体观念不无关系。

元好问功德碑、赐铁券之类“代王言”体裁是“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论的代表,如宋王应麟《辞学指南》云:“倪正父曰:‘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凡文皆然,而王言尤不可以不知体制。”<sup>⑫</sup>王应麟以“王言尤不可以不知体制”来说明“文章以体



制为先”的辨体的重要性。

关于“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论,南宋朱熹称:“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乡背”<sup>②</sup>,与元好问同时的严羽称:“荆公评文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sup>③</sup>,“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sup>④</sup>,真德秀称:“先要识体制”<sup>⑤</sup>;元代郝经、潘昂霄也有论述,如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称:“先儒谓作文体制之而后文势”<sup>⑥</sup>,潘昂霄《金石例原序》称:“文章先体制而后论其工拙”<sup>⑦</sup>;而王若虚亦称:“荆公论文,常先体制而后辞之工拙”<sup>⑧</sup>。凡此所引述的宋金元辨体文献,既可补元好问所论之不足,又说明了“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观念在宋金元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文学思潮。

其三是辨体与辨伪。“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观念作为辨伪方法发端于南宋朱熹、严羽。如朱熹《书张氏所刻潜虚图后》云:“此人好作伪书,而尚不识其体制,固为可笑,然亦幸其如此,不然,则几何而不遂至于逼真也耶”<sup>⑨</sup>,即认为作伪书者先要识得对方体制,否则容易被人辨认出来。在年龄及所处时代上,元好问与朱熹和严羽相比大体稍晚或同时,三者皆以辨体进行辨伪,其间是否有影响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问题。元好问辨体、辨伪方法也颇为丰富,且多为辨苏轼伪作,这与其崇苏有关。

元好问或着眼于文体内容之“义理”及语体特征之“鄙俚”,以辨东坡词之为伪作,如《东坡乐府集选引》:“就中‘野店鸡号’一篇,极害义理,不知谁所作,世人误为东坡。而小说家又以神宗之言实之……其鄙俚浅近……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谓东坡作者,误矣!”<sup>⑩</sup>朱熹亦从义理和文字的浅俗来辨伪,如《答李寿翁》:“麻衣易说熹旧见之,常疑其文字言语不类五代国初时体制,而其义理尤多浅俗,意恐只是近三五十年以来人收拾佛老术数绪余所造。”<sup>⑪</sup>严羽《木兰诗》辨伪与朱熹尤为接近<sup>⑫</sup>,皆从语言、格律等文体风格进行辨体、辨伪。

其或着眼于诗人身份和时代风格之风骨气象,如《木庵诗集序》:“东坡读参寥子诗,爱其无蔬笋气,参寥用是得名。宣、政以来,无复异议。予独谓此特坡一时语,非定论也。诗僧之诗所以自别于诗人者,

正以蔬笋气在耳。假使参寥子能作柳州《超师院晨起读禅经》五言,深入理窟,高出言外,坡又当以蔬笋气少之耶?”<sup>⑬</sup>朱熹、严羽亦从时代风格和作家的体制气象辨伪,如朱熹《答孙季和》:“小序决非孔门之旧,安国序亦决非西汉文章。向来语人,人多不解,惟陈同父闻之不疑,要是渠识得文字体制意度耳。”<sup>⑭</sup>严羽依据辨识诸家体制的整体风貌及某方面突出特点的差异,来考辨是非和识分真伪。如《沧浪诗话》:“余谓此篇诚佳,然其体制气象与渊明不类,得非太白逸诗,后人漫取以入陶集耳。”<sup>⑮</sup>

其或着眼于文体体制和书体字画,如《中州集》之“得古仙人词于壁间。然其首章直屋漏雨,为所漫剥,殆不能辨……观其体则柏梁,事则终始二汉,字画在钟王之间”<sup>⑯</sup>。此外,元初胡祇通还记载元好问从文体特征上辨析苏轼诗作之伪:“选择前人文字,亦穷理之一也……东坡《豆粥》诗,元遗山断以为非坡语,乃律赋歌括耳。”<sup>⑰</sup>清毕沅、阮元则从元好问“为文有绳尺”的辨体观念出发来辨析其碑文之伪,如《五峰山重修洞真观碑》:“史称好问为文有绳尺,备众体。今观此碑,平衍无出色处,或托名为之。”<sup>⑱</sup>

与元好问齐名的王若虚也是金源辨体、辨伪的代表,如辨析《史记》《汉书》史体时所谓“诸篇之体皆然”“缪矣”<sup>⑲</sup>、“不唯于文体为非”<sup>⑳</sup>云云,都是极为鲜明的例证。王若虚辨别杜诗伪谬,往往根据杜诗独特的文体风格进行辨伪,其依据就是“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sup>㉑</sup>的体格之辨。王若虚关于朱熹诗文的辨体、辨伪,其依据和方法也一样是辨析文体风格的不同,即“皆与前后文体大不相似”<sup>㉒</sup>,这与元好问所谓“观其体则柏梁”如出一辙。

### 三、“女郎诗”与“山石句”:“以词为诗”与“以文为诗”的破体论

“破体”是与“辨体”相对立的一组范畴,其表现主要有以文为诗和以诗为文、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以古为律和以律为古等对举形式。吴承学《破体之通例》云:“传统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十分重视‘辨体’……然而宋代以后,破体为文成为一种风气: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

律等在在可见。”<sup>⑧</sup>“破体”观念也是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文体思想的重要内容,第二十四首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sup>⑨</sup>诗作以秦观《春雨》诗和韩愈《山石》诗进行对比,进而凸显其破体观念上的褒贬之意,即对秦观“女郎诗”之“以词为诗”的讥贬和对韩愈“山石句”之“以文为诗”的推崇。此诗包含如下三层文体学内蕴:

其一是文体风格内蕴及文体观念源流。在诗体风格上,这体现了元好问崇尚阳刚与贬低阴柔之诗体风格,如“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后诗自注云:“钟嵘《诗品》评西晋张华诗:‘……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sup>⑩</sup>这些都反映了其推尊汉魏“风骨”“风云”的诗学祈尚。年长于元好问约三十岁的赵秉文亦推崇纵放、壮丽的诗风,以此来破除金代前期浮艳之风的轻靡软媚。元好问则对赵秉文诗体风格大加赞赏:“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sup>⑪</sup>。

这首诗的文体观念渊源为祖述其师王中立所言,如《中州集》卷九王中立小传:“予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破却工夫,何至学妇人?”此小传还记载:“先生平生诗甚多,有‘醉袖舞嫌天地窄,诗情狂压海山平’之句”。<sup>⑫</sup>在王中立众多诗作中选出此联,亦可见元好问崇尚风骨刚健的诗体风格倾向。

由于元好问及其《论诗三十首》的影响,元明诗话多有对此典故的记载,往往从诗体风格“柔婉姿媚”和“劲健骨力”之对立加以评价。如郭梦元《诗学正轨》:“元遗山尝问王中立作诗究当如何,中立因举少游《春雨》诗……遗山因作《论诗绝句》云:‘有情芍药含春泪……’,盖祖述其语也……故骨力标格,为作诗第一金针,其中又不可以不辨”<sup>⑬</sup>,肯定了“骨力标格”的诗体风格倾向为“作诗第一金针”。明瞿佑

《归田诗话》卷一“山石句”:“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内一首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按,昌黎诗云:‘山石荦确行径微……’遗山固为此论。然诗亦相题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雾云鬟湿……’‘俱飞蛺蝶相逐……’亦可谓女郎诗耶?”<sup>⑭</sup>在这里,瞿佑以杜诗为例,亦肯定诗歌的柔婉风貌。

王中立肯定“以诗为词”及崇尚清壮、豪放的词体观念也通过评价元好问词体现出来,可以与上文相对照并作为开启下文的先声。如王中立《题裕之乐府后》:“常恨小山无后身,元郎乐府更清新。红裙婢子那能晓,送与凌烟阁上人。”<sup>⑮</sup>其将元好问词与晏几道词相提并论,一方面褒扬元好问词体风格上的清新刚健,与晏几道词体之“清壮顿挫”及“清新”“豪迈”相似。关于晏几道词体风格,如黄庭坚《小山词序》:“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sup>⑯</sup>郑骞《成府谈词》:“小山词境,清新凄婉……小山词伤感中见豪迈”<sup>⑰</sup>。另一方面,黄庭坚称晏几道小令“寓以诗人之句法”,肯定其“以诗为词”,而王中立所谓“送与凌烟阁上人”则更超越了黄庭坚“以诗为词”的诗体句法崇尚,上升到了“诗言志”层面,而这正是“以诗为词”文体内蕴的思想本源。

其二是贬低秦观的“女郎诗”与“以词为诗”,肯定苏轼“以诗为词”。元好问贬低秦观“以词为诗”的破体观念,与其崇尚苏轼、辛弃疾的“以诗为词”及其豪放词风并在词体创作中体现出来息息相关。

首先是元好问的“以诗为词”观念及元明清文人评论其“以诗为词”。关于元好问的“以诗为词”观念,《新轩乐府引》云:“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sup>⑱</sup>这里有三层文体内涵:一是称词的本质为“吟咏情性”。这是说“词”与《毛诗序》所言诗“吟咏情性,以风其上”<sup>⑲</sup>的“诗言志”相通,其中的“情性”非词中所言男女之爱情和一己之悲情,而是传统儒家所提倡的诗歌当具有怨刺讽谏的政治功能,也即扭转传统的轻视“小词”而将“词”抬高到与“诗”相比肩的高度,这也是“以诗为词”的内蕴之一。二是关于词之“清壮顿挫”的豪放风格,



这与上文所言其师王中立将其词与晏几道并提,以及黄庭坚评价晏几道词“清壮顿挫”互为佐证。三是推崇苏轼、辛弃疾等的豪放词风和“以诗为词”之作。

关于元明清文人评价元好问“以诗为词”,诸多学者都看到元好问“以诗为词”之以“诗言志”推尊词体地位,及其豪放词风与苏轼、辛弃疾的相似之处,所论可以说皆为对其《新轩乐府引》文体观念的引申和阐发。这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元人王博文、赵文、刘敏中从《毛诗序》之“诗言志”“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内容功能方面看元好问词作“以诗为词”的文体特征。如王博文《天籁集序》:“乐府始于汉,著于唐,盛于宋,大概以情致为主,秦、晁、贺、晏,虽得其体,然哇淫靡曼之声胜。东坡、稼轩,矫之以雄词英气,天下之趋向始明。近时,元遗山每游戏于此,掇古诗之精英,备诸家之体制……宜其独步当代,光前人而冠来者也……平生留意于长短句……辞语遒丽,情寄高远……感事兴怀,皆自肺腑流出”<sup>①</sup>。所谓“以情致为主”“情寄高远”“感事兴怀”“掇古诗之精英,备诸家之体制”“东坡、稼轩,矫之以雄词英气”,正是看到了元好问与苏轼、辛弃疾依循“诗言志”而“以诗为词”的前后相承关系。又如赵文《吴山房乐府序》:“声音之为世道耶,世道之为声音耶……近世,辛幼安跌宕、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而江南言词者宗美成,中州言词者宗元遗山。词之优劣未暇论,而风气之异,遂为南北强弱之占,可感已。”<sup>②</sup>这是说元好问在金元易代之际,其词所体现的“声音之为世道”与《毛诗序》所云“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sup>③</sup>的表述息息相通。再如刘敏中《江湖长短句引》:“吟咏性情莫若诗……而乐府之制出焉,则又《诗》之遗音余韵也。逮宋而大盛。其最擅名者,东坡苏氏,辛稼轩次之,近世元遗山又次之。三家体裁各殊,然并传而不相悖”<sup>④</sup>。即认为之所以元好问与苏轼、辛弃疾“三家体裁各殊,然并传而不相悖”,正是在于三家“词”皆如“诗”,即“吟咏性情莫若诗”“乐府之制出焉,则又《诗》之遗音余韵也”。

二是明清文人从“诗言志”的角度或“苍茫雄健”

的豪放风格上将元好问与苏轼、辛弃疾作对比。前者如明毛凤韶《中州乐府跋》:“中州乐府作于金人吴彦高辈……盖古诗之余响也。”<sup>⑤</sup>所谓词为“古诗之余响”,正是词为“诗余”的推尊词体地位的体现。后者如明徐士俊《古今词统》:“《点绛唇》(起句:绣佛长斋)评:仿佛坡仙。《满江红·对酒》(起句:天上飞鸟)评:……遗山极称辛词,宜其似之。”<sup>⑥</sup>清翁方纲评遗山七言诗曰:“《湘夫人咏》苏、黄之后,放翁、遗山二家并骋词场,而遗山更为高秀……要亦于神骨辨之。”<sup>⑦</sup>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卷三评《洞仙歌·黄尘鬓发》:“颇似坡仙笔路”,评《鹧鸪天·隆德故宫》:“苍茫雄健,竟似稼轩手笔”。<sup>⑧</sup>陈廷焯也因此认为“遗山词可称别调”<sup>⑨</sup>,看到元好问“以诗为词”的“别调”破体特征。

三是清人通过辨析“诗”体与“词”体之别的辨体来看待元好问的“以诗为词”。持赞许态度的如章耒《元遗山先生新乐府序》:“而即事寄意,与苏、辛可并传者,于本朝得顾贞观,于金源得元好问。好问之诗,金源诗人之巨擘也,词亦如其诗。或谓好问词能刚不能柔,故多筳角之音,律以梁汾《弹指词》,似不知词者……而词法则以苏、辛之法为法”<sup>⑩</sup>。其认为元好问“词亦如其诗”与“词法则以苏、辛之法为法”有关,苏、辛“词法”即“以诗为词”。卢文昭和况周颐则从易代遗民经历着眼,认为其词也如诗般充满故国之思和亡国之恨,是《毛诗序》“亡国之音哀以思”的“诗言志”反映。如卢文昭《遗山乐府题辞》:“遗山诗浑雄沉郁,有唐大家之嗣响也。老来更得其乐府读之,妍雅而不淫,和易而不流,其抒情也婉以畅,其赴节也亮以清……遗山生当易代,其诗不胜故国故君之思,今乐府中亦时时遇之。”况周颐《蕙风词话》:“遗山乐府,学闲闲公体。”<sup>⑪</sup>元好问《促拍丑奴儿》词标注“学闲闲公体”,为效体于赵秉文《青杏儿》“风雨替花愁”而作,词中亦满含身世漂泊之感和易代悲愁。

其次是贬低秦观“以词为诗”与推崇苏轼“以诗为词”。关于秦观的“以词为诗”或者说“诗似小词”之说,北宋以来多有所论,且往往与苏轼之“以诗为

词”相对照而言。如北宋《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sup>⑧</sup>南宋陈应行《于湖先生雅词序》：“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才之难全也”<sup>⑨</sup>。二者所言相近，皆为客观描述，无所轩轻和褒贬。清吴景旭从秦观词写得符合婉约之当行本色，认为其以写婉约本色词的手法写诗“未免踏入软红尘去”，进而肯定“遗山所咏，切中其病”，如评“女郎诗”曰：“遗山论诗，直以诗作论也……少游乃填词当家。其于诗场，未免踏入软红尘去，故遗山所咏，切中其病。他日又书以自警，盖知之深，言之当也。”<sup>⑩</sup>所谓“盖知之深，言之当也”云云，说明元好问对“以词为诗”“以诗为词”类的破体理论极为熟悉，故而运用这种文体理论进行文体批评时便恰如其分。

由于对辨体和破体所秉持的态度不同，宋人对于苏轼的“以诗为词”往往也褒贬不一，贬之者如李清照、陈师道，褒之者如陆游、王灼、刘辰翁等。贬之者最著名的是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sup>⑪</sup>，从词体婉约本色角度将苏轼与秦观词作对比，进而贬低苏轼“以诗为词”。宋以来尊崇苏轼“以诗为词”者，往往通过指责陈师道的观点来加以揄扬，此类颇多，兹不赘述。在此，我们以王若虚尊崇苏轼“以诗为词”来说明与元好问相似的文体观念。

王若虚针对陈师道的言论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诗词只是一理”，并对苏轼“以诗为词”大为欣赏，如《滹南诗话》：“陈后山谓子瞻以诗为词，大是妄论，而世皆信之，独茅荆产辨其不然，谓公词为古今第一。今翰林赵公亦云此，与人意暗同。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sup>⑫</sup>所谓“今翰林赵公亦云此”，说明赵秉文也认同王若虚的观点，也就是说元好问、王若虚、赵秉文等当时的文坛或政坛大家皆肯定苏轼“以诗为词”，在当时形成了金代文人的文体共识和普遍好尚。

王若虚、赵秉文这种肯定“以诗为词”的一致好尚，清人施国祁论及时也将元好问归纳进来，称：“殆北朝好尚如此。遗山《新乐府》亦未免习气”，如《绣谷写本滹南集说》：“又坡翁以诗人词，为后人诟病，《诗话》不伏此论，以南宋词纤柔俗好，日趋委靡，而推铜琶铁拨为古今第一，殆北朝好尚如此。遗山《新乐府》亦未免习气。”<sup>⑬</sup>施国祁所评正是王若虚称苏轼“为小词而无脂粉纤艳之失”的反映，如《滹南遗老集》卷三六：“东坡之文，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为小词而无脂粉纤艳之失……而世或谓四六不精于汪藻，小词不工于少游……岂知东坡也哉？”<sup>⑭</sup>对此，赵维江亦称：“至金末元初，‘以诗为词’已成词人共识”<sup>⑮</sup>。

其三是推崇韩愈“山石句”与“以文为诗”，辅以杜甫“以诗为文”来看破体价值序列。元好问也如王若虚一样，通过批驳陈师道的观点来大力肯定韩愈“以文为诗”，并指出其“可笑者三也”。如《中州集》卷二刘汲小传：“屏山为作序云：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谓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何后世议论之不公耶……公言韩退之以文为诗，如教坊雷大使舞，又云，学退之不至，即一白乐天耳。此可笑者三也。嗟乎！此说既行，天下宁复有诗耶？”<sup>⑯</sup>文中还以稍长于元好问的金代文坛大家李纯甫（屏山）关于“然则诗者文之变也”之言来肯定“以文为诗”。又如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以“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sup>⑰</sup>之论来肯定韩愈“以文为诗”，与引述李纯甫之论如出一辙。

元好问之肯定韩愈“以文为诗”也在创作中有所体现，如清翁方纲评《虞坂行》：“此一首虽云寄托磊落，然转折太多，不免似散文耳。盖遗山诗，多取英奇之气，于篇中振拔，见其格韵，而对偶或少也。”<sup>⑱</sup>

元好问和王若虚肯定韩愈“以文为诗”的观点渊源有自，宋人诗话中此类观点亦颇多。我们只举同时谈及韩愈“以文为诗”和杜甫“以诗为文”的两例，

来看宋人对该破体范畴的不同意见。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述及“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sup>⑧</sup>。陈善《扞虱新话》:“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sup>⑨</sup>在这里,陈师道和陈善都将“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对举而言,陈师道从辨体的角度对韩、杜都表示反对,陈善则从破体的角度对其都持肯定态度。

实际上,历代以诗话为主的评论总体上肯定“以文为诗”而反对“以诗为文”,这与肯定“以诗为词”而反对“以词为诗”相通。其真正原因在于“破体”观念的不同祈尚和价值倾向,即在传统文体价值序列中,往往认为文高于诗,诗高于词,古高于律,所以在“以文为诗”和“以诗为文”、“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以古为律”和“以律为古”等对立破体形式中,前者往往被认可,而后者则往往被贬低。其原因正如吴承学所云:“为什么古可入律而律不可入古……古诗品位高,故提高律诗的格调;律诗品位低于古诗,故降低了古诗的格调。其道理颇似高度酒与低度酒的互相调配。”<sup>⑩</sup>诗文和诗词破体的双向互动亦同此理,这也就能解释元好问为何存有贬低秦观“以词为诗”和崇尚韩愈“以文为诗”的文体观念了。

## 结语

综上所述,元好问的文体观念系统而严整,是其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理解和认识其文体观念的内蕴特征、形成背景及地位影响,需要把握如下几个关键环节,而这几个关键环节像链条一样环环相扣并依次递进。

其一是师法前人之文学宗尚及文体倾向。无论文学、文体还是人格、思想,元好问于此都最崇尚杜甫、韩愈和苏轼、黄庭坚,其源头则在《诗经》风雅和汉魏风骨,而这些唐宋大家都与他的文学观念和文体观念息息相关。

其二是《论诗三十首》之文学观念总纲。元好问所宗尚的上述“唐宋四大家”都在《论诗三十首》不同诗作中多次被提及并推崇备至,如杜甫之“少

陵自有连城璧”“古雅难将子美亲”,韩愈之“江山万古潮阳笔”“拈出退之山石句”,苏轼、黄庭坚之“只知诗到苏黄尽”“苏门果有忠臣在”“论诗宁下涪翁拜”等。<sup>⑪</sup>

其三是《论诗三十首》之文体观念总纲。元好问丰富的文体文献虽主要散见于其诸多著述篇章中,但都围绕着“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及“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这两个文体总纲。尤其是“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堪称总纲中的核心,其重要性在前文的论述中已自现出。

其四是文体观念之“一祖三宗”。我们戏借方回称“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杜甫仍为“一祖”,三宗为韩愈、苏轼、黄庭坚。之所以说杜甫为其文体观念之“祖”,一是《论诗三十首》之文体形式源于杜甫《戏为六绝句》,而“遗山体”这一最能代表元好问文体观念的“文体标签”,如前文所述主要指《论诗三十首》及清人掀起的效体高潮。二是“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亦源出于《戏为六绝句》之“劣于汉魏近风骚”和“别裁伪体亲风雅”<sup>⑫</sup>,且“正体”与“伪体”对举,并暗含了杜诗的“亲风雅”内蕴,因为《论诗三十首》并未明确提及《诗经》风雅。三是元好问著有《杜诗学》,被誉为“少陵嫡派”,其成因虽很多<sup>⑬</sup>,但元好问的文体观念受杜甫文体学思想影响无疑亦为其中缘由,即杜甫“以文为诗”的破体观念。<sup>⑭</sup>学界向来认为韩愈“以文为诗”的先驱即为杜甫,且正是杜、韩开启了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之“以文为诗”的先声。四是“一祖三宗”皆“以文为诗”,且杜甫是“以文为诗”的代表,而苏轼又是“以诗为词”的典型。此外,方回“一祖三宗”之说或受元好问影响,如《杜诗学引》称述其父元德明所言:“先东岩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sup>⑮</sup>,元好问卒年时方回三十岁,或可见其影响关系。

其五是文体观念之政治及时代意义。与文学观念总与时代及政治息息相关不同,文体观念似乎离治乱兴亡和朝代更迭更远些,但轰动一时的崔立碑事件及其铁券文批评所体现的元好问的文体观念,



则揭示了文体观念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

其六是文体观念之民族文化融合价值。行文中我们除了要联系唐宋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大家对元好问的影响,还要结合朱熹、真德秀、严羽、王若虚、刘祁、赵秉文、郝经、潘昂霄、方回等人的文体观念加以互相印证,跳出孤立的文体苑囿,以见其间文体观念的交互融通,并从中认识到元好问的文体观念是特定时期文学思潮的回响。更重要的是,这种文体观念的融合显然是宋金元民族文化融合的时代反映。尤其是金元易代之际,以元好问等为代表的遗民士人“当家国危亡,文化面临断裂的危机时”企望“文化重建”的担当。<sup>⑨</sup>凡此皆为元好问对其北魏拓跋氏后裔身份的认同,编纂《中州集》以诗存史的信念,及其觐见并说服元世祖忽必烈尊信儒学和任用儒士治国的文化共同体理念的集中体现。

#### 注释:

①参见余敏《论元好问碑志文的文体观》,《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赵维江:《效体·辨体·破体——论元好问的词体革新》,《文艺研究》2012年第1期;赵维江、夏令伟:《论元好问以传奇为词现象》,《文学遗产》2011年第2期;王伟勇:《元好问〈遗山乐府〉四阙“仿拟体”作品考述》,《词学》2010年第1期;乔芳:《元好问碑志文分类研究》,《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张海明:《本诚宗雅论正体——元好问诗论述评》,《民族文学研究》1990年第1期。

②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5页。

③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第1册,第65页。

④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864页。

⑤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57页。

⑥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下册,第1326页。

⑦孔凡礼编《元好问资料汇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34-35页。

⑧同上书,第280页。

⑨同上书,第44-45页。

⑩孔凡礼编《元好问资料汇编》,第264、147页。

⑪同上书,第35、45页。

⑫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5册,第1780页。

⑬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8册,第2681页。

⑭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上册,第256-257页。

⑮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第2册,第963页。

⑯孔凡礼编《元好问资料汇编》,第136、303、262页。

⑰同上书,第45页。

⑱夏静、宋宁:《作为方法的文体批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⑲孔凡礼编《元好问资料汇编》,第460页。

⑳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溇南遗老集校注》,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年,第385页。

㉑同上书,第285页。

㉒同上书,第413页。

㉓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2册,第383页。

㉔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溇南遗老集校注》,第427页。

㉕吴承学:《辨体与破体》,《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

㉖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2册,第775页。

㉗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7页。

㉘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溇南遗老集校注》,第494页。

㉙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上册,第328页。

㉚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册,第816页。

㉛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2册,第383页。

㉜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8册,第2744页。

㉝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上册,第180页。

㉞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第1册,第397页。

㉟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第2册,第842页。

㊱周祖饕编选《隋唐五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 ②孔凡礼编《元好问资料汇编》，第36、43、68-69、34-35页。
- ③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第1册，第66、72页。
- ④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下册，第1400页。
- ⑤同上书，第1345-1346页。
- ⑥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溇南遗老集校注》，第568页。
- ⑦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4册，第1371页。
- ⑧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7册，第2396页。
- ⑨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溇南遗老集校注》，第151页。
- ⑩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7册，第2412页。
- ⑪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上册，第477页。
- ⑫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9、619页。
- ⑬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3页。
- ⑭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二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2-293页。
- ⑮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第265-266页。
- ⑯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一二，第138页。
- ⑰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2页。
- ⑱孔凡礼编《元好问资料汇编》，第43、54、81、35页。
- ⑲同上书，第189、136、275页。
- ⑳同上书，第29、42页。
- ㉑费经虞：《雅伦》卷二，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 ㉒张潜辑《诗法醒言》卷一〇，乾隆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 ㉓孔凡礼编《元好问资料汇编》，第166页。
- ㉔叶廷琯：《鸥波渔话》卷六，同治九年(1870)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 ㉕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四四，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 ㉖谢章铤：《赌棋山庄集》卷五，光绪十年(1884)刻本，香港

中文大学图书馆藏。

- ㉗祁寓藻：《祁寓藻集》第2册，太原：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428页。
- ㉘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卷一七一，民国退耕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 ㉙杨泰亨等纂《慈溪县志》卷三二，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 ㉚脱脱等：《金史》卷一二六，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37-2738页。
- ㉛余敏：《论元好问碑志文的文体观》，《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 ㉜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溇南遗老集校注》，第426页。
- ㉝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上册，第28页。
- ㉞同上书，第30-33页。
- ㉟参见王隽《铁券文的文体形态和文体源流》，《求索》2011年第3期。
- ㊱王应麟：《玉海》附《辞学指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8册，第294页。
- ㊲陶秋英编选，虞行校订《宋金元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08页。
- ㊳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695页。
- ㊴同上书，第707页。
- ㊵王应麟：《玉海》附《辞学指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8册，第310页。
- ㊶陶秋英编选，虞行校订《宋金元文论选》，第474页。
- ㊷潘昂霄：《金石例》“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2册，第291页。
- ㊸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溇南遗老集校注》，第409页。
- ㊹朱熹：《晦庵集》卷八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5册，第680页。
- ㊺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上册，第397-398页。
- ㊻朱熹：《晦庵集》卷三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4册，第61页。
- ㊼参见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328页。
- ㊽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册，第

1086-1087页。

⑧朱熹:《晦庵集》卷五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4册,第619页。

⑨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702页。

⑩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5册,第1780页。

⑪胡祇通:《紫山大全集》卷二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第455页。

⑫孔凡礼编《元好问资料汇编》,第252页。

⑬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溇南遗老集校注》,第114-115页。

⑭同上书,第194页。

⑮同上书,第435页。

⑯同上书,第87页。

⑰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362页。

⑱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第1册,第67页。

⑲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第1册,第46-48页。

⑳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2册,第775页。

㉑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7册,第2415-2416页。

㉒孔凡礼编《元好问资料汇编》,第177页。

㉓同上书,第100页。

㉔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7册,第2421页。

㉕晏殊、晏几道著,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03页。

㉖郑骞:《成府谈词》,《词学》第10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㉗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下册,第1384页。

㉘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㉙孔凡礼编《元好问资料汇编》,第49-50页。

㉚同上书,第62页。

㉛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63页。

㉜孔凡礼编《元好问资料汇编》,第76页。

㉝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8册,第2947页。

㉞孔凡礼编《元好问资料汇编》,第122页。

㉟同上书,第234页。

㊱陈廷焯编选《词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

373-374页。

㊲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22页。

㊳孔凡礼编《元好问资料汇编》,第312页。

㊴同上书,第184、333页。

㊵胡仔编《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84页。

㊶孙克强编著《唐宋人词话》(增订本)下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54页。

㊷孔凡礼编《元好问资料汇编》,第182页。

㊸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309页。

㊹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7页。

㊺王若虚著,马振君点校《王若虚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893页。

㊻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溇南遗老集校注》,第417页。

㊼赵维江:《效体·辨体·破体——论元好问的词体革新》,《文艺研究》2012年第1期。

㊽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第2册,第383页。

㊾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册,第1022页。

㊿孔凡礼编《元好问资料汇编》,第233页。

㊱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303页。

㊲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205-206页。

㊳吴承学:《从破体为文看古人审美的价值取向》,《学术研究》1989年第5期。

㊴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第1册,第45-74页。

㊵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第5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506、2511页。

㊶参见狄宝心《元好问诗获少陵嫡派之主因》,《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㊷参见任竞泽《杜甫的文体学思想》,《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㊸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上册,第91页。

㊹参见张勇耀《金元易代与“文化重建”——元好问与“河汾诸老”的人生选择及文学精神新论》,《民族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